

《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

人

大荒冰河

张抗抗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

大荒冰河

张抗抗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

大荒冰河

著 者:张抗抗

责任编辑:包兰英

封面设计:王 欣

出版发行: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2.75

标准书号:ISBN 7—206—02917—5/K·98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000 册 定 价:31.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心仪自然



1968年冬,“文革”期间,胸前还佩戴毛主席像章。



1969年6月,离开陆家湾,报名去北大荒。临别杭州前,摄于苏堤。



1969年3月,去德清洛舍陆家湾插队之前,同行的三个女生在西湖边合影(左为作者)。



1975 年春节,与父母在杭州上天竺茶园。



1976 年秋,在北大荒鹤立河农场场部前。



1977 年 2 月,与农业技术员王春燕大姐及其子女合影。



1977年3月,欢送于淑花去“小”农上学,场部机关女知青合影(前排右一为作者,右二为于淑芬)。



1977年6月,离开鹤立河农场去哈尔滨上学前,场部各科室机关干部欢送我合影(前排右四为作者)。

背负苍天的一代 (总序)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年份不应该被忘记，这就是 1968 年。现在 45 岁到 55 岁之间的人，应该清楚地记得那一年。伴随着毛泽东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的发表，数千万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初、高中学生离开父母，打着红旗，背着背包，乘着火车、卡车、马车，从沪上，从京华，从大大小小的城市，像遍布 960 万平方公里的河流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向关东、塞北，涌向巴山蜀水、版纳丛林，涌向黄土高原、荒漠戈壁，涌向千千万万的山庄、村落、农场。那场面是波澜壮阔的，那情景是激动人心的。从那时开始，演绎出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悲欢离合，演绎出了共和国的一次新的嬗变。

从生根开花的初衷到席卷回城的大潮，从大有作为的雄心到一无所有的惶惑，从待业的焦虑到寻觅出千姿百态的归宿，从恢复高考的希望到



临时工与出国留学的天渊之别，从“文革”10年浩劫到20年改革开放的震荡，历史给一代人出了一道几乎死谜一样难解的命题。在解答这个命题的过程中，有血的殷红、汗的辛酸、泪的苦涩，有艰难中的求索与逆境中的崛起，也有放弃求索的天折与沉沦。30年中，一代人跨跃两个时代，历尽人间的苦辣酸甜。

如今，在当年数千万知青大军中，有的人崛起了，成为我国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和骨干；也有许多人始终没有在时代的变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历史潮流的涌进中沉入河床。我无意于对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做简单的类比和解释。人是历史的、社会的，同时也是个性的，人的成功与失败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总结。但是，在逆境中奋发拼搏，把种种的人生经历变成财富，把最太的苦难咀嚼粉碎，凭着一股坚定的意志向前走，却是一条成功的公理。我相信，正是靠着这样的力量，许多人走出困惑，走向新生活；也正是靠这样的力量，我们的国家才一次次地从黑暗走向光明。

吉林人民出版社推出《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这套丛书的推出，适逢我国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其意义在于，时隔30年后，向人们提醒，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这套丛书将陆续推出陈建功的《十八岁面对侏罗纪》、高洪波的《也是一段歌》、肖复兴的《触摸往事》、叶辛的《往日的情书》、赵丽



宏的《在岁月的荒滩上》、陆星儿的《生是真实的》、贾平凹的《我是农民——在乡下的五年记，忆》、叶广芩的《没有日记的罗敷河》、张抗抗的《大荒冰河》、毕淑敏的《在印度河上游》、范小青的《走不远的昨天》、王晓鹰的《可怜无数山》等十余部作品。丛书的作者都是这场“知青运动”的亲历者，也是这一代人中活跃在当代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代表人物，对于这场“知青运动”，他们当有更为深刻的体验，更为清醒的领悟。相信他们的叙述、他们的辨析，对于今天的人们对30年前的那一段历史，对30年来历史的认识，是有帮助的。

我自己也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在我的亲人和朋友中，参加过这场运动的人也有很多。回想这30年，感觉就像背上了整整的一座苍天。天是厚重的，有千百里高，有亿万钧重；天又是空灵的，不会把人压倒。30年的历史，怎样去看，怎样去对待，我拿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即使有一个答案，对我自己是适合的，也不见得对别人适合。但是人对于历史，尤其是对于亲身经历的国家民族的大时代的历史，不应当忘却，也不应当耿耿于怀。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代人背上的厚重的历史，也不要被它压垮。就像背负苍天，把天背在身上，把脚踩在地上，去求索，去生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遭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衷心地祝愿以“老三届”为代表的共和国的长子们肩负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



义无反顾地、出色地实践它、完成它！也衷心地希望当代青年能从父兄的历史足迹中，更深刻地去解读历史、去体会人生的经验和教训，清醒、理智、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时代的大潮，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振兴的历史进程中留下“这一代人”的坚实足迹！

姜大明

1998年2月于北京

注：总序作者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自序

回忆往事是痛苦的，这意味着要将岁月残留的记忆——那些被一次次无法躲避的风暴和雷电击碎的，并已嵌入我的身体和心灵中的弹片，连血带肉地撕揭下来，一片片一丝丝，再重新缝合成一个似是而非、似我非我的人形。

我想，那已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我。

人——会遗忘、会矫饰、会回避、会妄想。通常，我们遗忘的是平淡，矫饰的是弱点，回避的是错误，妄想的是快乐。所以，当我不得不开始这一项我本不愿做，却又是必须做的事情时，我才真正发现——人要正视自己是多么困难。

是否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才会出现那句叫做“青春无悔”的话语？轻松靓丽俯拾即是众口一词，就像在这些年间流行的时尚用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前我的一篇短文被一家报纸转载时，编辑将此文安上了一个“青春无悔”，的大字标题。然而，在此以前我从未使用过这个时髦的词组，我不知道那位编辑究竟是由于年长还是过于年少？这个赫然入目的标题使我



久久疑惑，我一次次地反问自己——一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青春、时间和生命，真的是能用“青春无悔”这般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

但人们往往没有勇气否定自己，我们曾激烈批评的都是别人的历史。当父辈们的青春岁月被退潮的海浪席卷得踪影杳杳之后，我们在免死狐悲的恐惧中，开始本能地挣扎，拼命想为自己留出一块容身的礁石。如果失去了这最后的营盘，我们的灵魂就将四处游荡无所归依，而沦为世纪末活生生的殉葬品。我们不愿不肯不忍也决不能承认自己的人生有一大块空白，因为，我们不再有填补这空白的时间了。我们只能以曾经有过的“荣耀”和“辉煌”，来支撑、慰藉那一颗颗苦涩的心。

如此的自欺欺人，其实同我们所批评的上一辈人，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

我们若是“青春无悔”，那些本应该向我们忏悔——制造了专制与愚昧、牺牲与残害了这一代人的那些始作俑者、鼓吹者和实施者，岂不是轻易地逃脱了历史的审判和追究！

也许，一个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忏悔”的遗传基因的。“忏悔”的概念来自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教义，汉语“忏”是梵文 KSAMA 音译之略，“悔”是它的意译，合称“忏悔”。原指“人”对别人或是至高无上的神灵，坦诚自己的过错，以求得宽恕。“忏悔”意识源于人的原罪感，



即人对于自己那些与生俱来的恶欲、潜在犯罪意识的惶恐，以及由此产生的理性抑制；“忏悔”是属于精神范畴的活动，企图通过自我检讨和反省，排除恶念，大彻大悟，以待再生。

在华夏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教，也主张“吾日三省吾身”，但那是非神性、非本质、非世界观的，而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人即是自己道德的评判者，人可由良心来调整管束，管束的标准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若是自己将标准放松，莫说“三省”，就是“九省”也通过了，何况那是省“身”而非省“心”。

至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奴役下，各种虚假的“思想汇报”和“坦白交待”漫天飞舞。那些真诚而愚昧的“交待”、“交心”，变成了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的罪证，而更多的人貌似痛心的“悔过”假象，却完全出于被迫，成为“蒙混过关”的形式。若是说我们的百年史上有过类似忏悔的“洗心革面”，也是如此被扭曲的一种实用、伪诈的求生之道。

在这条延续千年的民族文化脉络上，20世纪求的“青春无悔”，产生得多么顺理成章啊！

我在1987年曾经发表过一部描述知青生活的中篇小说《永不忏悔》。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

我并非故意让大家难堪，我只是觉得心里有许多过去留存下来的谜尚未解开。为别人，也为自己。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灵魂真正轻松过吗？



面对往昔，也许没有人能够坦然自若。当我们互相凝视时，每一双眼睛里都有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自己，只是谁都缄口不言罢了。

历史不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的。

谁有勇气问问自己？

但即便是忏悔，又有谁有资格来充当接受我们忏悔的神父呢？

从《永不忏悔》这部小说题目可以看出，我试图探讨的恰恰是同“忏悔”有关的话题——检点过失与推委过失。在人的内心深处，常常为自己的过失而不安，但这种不安又拒绝自责，因为自责会加重不安。因此，就需要寻找某些理由来掩饰或解释过失，以期将不安从心中逐渐删除。

当“知青文学”走过了展示伤痕、诉说苦难的阶段之后，它开始向纵深处反思知青自身——“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中，一切悲剧中所蕴涵的人性因素。如果知青能够正视自己当年的愚昧无知，正视狂妄自大和胆怯懦弱，正视虚荣和野心，正视私欲和利己动机，知青便没有权利认为所有的错误和罪孽都是时代造成的；知青不仅仅只是受害者，在受苦受害的同时，为了摆脱苦害，知青彼此间的残酷争斗，甚至波及到周围的人，直至互相心灵的严重戕害。当我们探寻悲剧的根源时，我们痛心地发现，原来知青与“文革”是互为因果的。恰恰是这一代人的行为和思想，维护并维持了旧日的体制；他们是悲剧的扮演者，其



实也是剧中人之原型。

与此同时，“无悔”的颂歌却已飘扬为 90 年代的知青旗帜。

连“正视”都如此艰难，怎么会有“忏悔”意识生存的土壤呢？

何况，向谁“忏悔”？到了上帝和“人”都已经“死亡”的 20 世纪末，还有没有一种绝对的精神原则，能够承担“忏悔”？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硬说“忏悔”似乎有些虚情假意、强加于人。“忏悔”的前提是觉悟是自我认识；“忏悔”的作用是改错是超越自我——如果“忏悔”真的不符合中国国情，那么，就让我们先来自我审视一番行不行呢？就让我们对自己扪心自问、从头梳理一遍行不行呢？

我想这绝不是一种“马后炮”式的嘲弄和不恭。如果“我们”老三届人至今仍对自己当年曾经拥有的所谓“真诚”，抱着欣赏留恋的态度；对那种旷世愚昧和空前绝后的非人道行为，非但毫无认识甚至置若罔闻或姑息迁就；并且还以如此之价值观去教育子女——那么，“老三届”人便无可救药地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一块基石，迟早会被新世纪的掘进机无情地清理！

曾有人问，文革是从“文革”开始的吗？反右是从“反右”开始的吗？

延安整风是从“延安整风”开始的吗？

如果“我们”对此不闻不问，岁月的长河中包括我们心爱的子女的未来时日，定然还有什么



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会开始会发生的啊！

我只能一意孤行地朝前走。

诚然，“老三届”人和“老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丧失了继续升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把汗水洒在了陌生的土地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扑火抗洪抢救集体财产；我们把知识传播到偏僻荒凉的山野乡村，为贫下中农子女教书治病；我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科学种田搞发明创造；许多人因超负荷劳动而留下终身疾病和伤残，有些女知青惨遭歹徒兽性的凌辱，更有一些人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广阔天地……如此巨大的付出之后，等待我们的却是返城后的无学历无技能无房无钱上有老下有小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病痛失业下岗的种种困扰和尴尬境地……

那是我们整个的青春岁月，所能为国家作出的最大牺牲了。

牺牲和奉献往往是无偿的，剩下的只是那一次次的“知青聚会”中，惺惺惜惺惺的互相理解、援助，还有惨淡的回忆。

但所有那些往日“辉煌的业绩”，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的骄傲和慰藉吗？

历史从不以动机衡量功过，历史是很“势利”的，它只认得效果——用当下的语词来表达，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所谓的“社会效益”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恰恰是“老三届”的红卫兵们，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把城市红卫兵的野